

# 梁启超与台湾

张春英

**论文提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因《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与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他十分关注台湾的历史命运和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他会见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领袖——林献堂等，为其制定了“爱尔兰式”的温和主义的斗争策略；他亲访台湾，开启民智，激励台湾同胞的爱国情感和斗争信心。在梁启超思想影响下，台湾同胞进行了体制内的抗争，相继发起了“六三法”撤废运动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运动虽未能成功，但对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 台湾 民族民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于次年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祖国的宝岛台湾。这令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痛心疾首之际，寻求变革中国社会的良方。梁启超，作为这一时代的风云人物，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实践，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以武装起义直接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一次次遭到镇压而失败了。在日本已经建立起巩固的殖民统治秩序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抗殖反日斗争，台湾同胞也在探求斗争的方法。因变法失败而流亡在外的梁启超，十分关注台湾的历史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反抗斗争。他会见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领袖，并亲访台湾，开启民智，为台湾同胞制定斗争策略。他的“温和主义的斗争方式”同样激励了台湾同胞的抗日信心。在此影响下形成的民族民主运动，成为台湾同胞反殖斗争的一种方式，对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 （一）梁启超初会林献堂，指出抗争新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1895年5月，为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未果后，“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1898年9月21日，历时百日的“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救亡图存，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意识形态。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逐步的转变，由最初主张君主立宪，转变为坚决反对君主复辟；对民主共和政体，也历经了追求、反对、拥护、捍卫到失望的曲折过程。然而，作为一个爱国者，梁启超对祖国的宝岛台湾寄予了无限的关爱，并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影响着台湾同胞。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同胞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占领，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运动，但这些“义不臣倭”的抗日斗争最终被日本殖民主义者镇压了。日本统治者在实施暴力镇压的同时，也笼络一些台湾士绅，企图实行“以台治台”，以怀柔政策统治台湾人民。但是，除了极少数人甘为日本人的统治工具外，绝大多数台湾士绅持消极态度甚至反感、愤怒。在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同胞心中根深蒂固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始终没有泯灭，许多爱国士绅和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摆脱殖民统治的方法，不断进行民族抗争运动。林献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献堂（1881~1956），名大椿，号灌园，出身台中雾峰的望族。从小在私塾

中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并受其父林文钦影响，养成悲天悯人、心怀民族大义的抱负。日本侵占台湾时，林文钦曾招募义勇军抗日。起义失败后，本打算内渡大陆，但因老母亲年老不能乘船渡海，就暂时在台湾隐居起来。当时年方 15 岁的林献堂率全家 40 余口内渡泉州晋江避难，事件平息之后才率家人返回台湾。1900 年，林文钦逝世，林献堂成了雾峰林家的中心人物，曾被邀请出任雾峰区长。1905 年，台湾制麻株式会社成立，林献堂出任董事。在其侄林幼春的介绍下，林献堂大量阅读了梁启超的著作，对梁启超产生了深深的仰慕。梁启超倡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使林献堂的思想为之一振，林献堂决定亲自赶赴日本向梁启超请教。

1907 年春，林献堂第一次到东京旅行，特意前往横滨《新民丛报》社拜访梁启超。梁启超当时不在报社里，林献堂失望而归。后来，林献堂在奈良的一家旅馆中巧遇梁启超，立即就台湾前途问题向梁启超请教。两人因言语不通，只能以笔交谈。

据同行的甘得中回忆：“先生（指梁启超）初落笔则曰：‘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余惜未能记忆，仅这几句，其伤时怀世之情感早已动人，几使我们为之泪下。”<sup>1</sup>

甘得中回忆当时的情形：“翁（指林献堂）即出林儒氏之介绍信，继云：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先生（指梁启超）答称：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火，终被压杀无一幸存，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乃举例说，英国漫画家绘两位爱尔兰人，以一条绳索各执一端，将英首相绞杀，这意味着爱人议员在英国会议席虽不多，但处在两大党之间，举足轻重，势固得以左右英内阁之运命，你们何不效之？我们闻之，真是妙不可言，自是铭心印脑，继请先生来台一游，梁先生曰：我早有此想，因曾闻后藤新平说台湾如何进步，极事铺张，且云非如李鸿章所谓台人强悍难治也，果如后藤所说，将来或可为我国借鉴。”<sup>2</sup>同时，梁启超要求台湾同胞，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手段，多多结识日本的政界要人，以此牵制日本殖民当局，使其不至于过分压迫台湾人民。梁启超所谈非暴力温和的民族运动路线，给台湾同胞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初次见面，梁启超对台湾同胞诚挚的关怀、深切的同情，使林献堂极为感动而更加钦佩。梁启超的宏观大略，又使林献堂大受启发，他因台湾总督府压迫虐待台湾同胞而深感悲愤但又不知如何解脱的抑郁心境，豁然开朗。这次会见，更加坚定了林献堂斗争的信心，成为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林献堂立即邀请梁启超待机前往台湾，向台湾人民宣传进步思想；同时希望梁启超为他引见日本政要，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的开展打下基础。

## （二）梁启超访台湾，释放爱国情怀

1911 年 2 月 24 日（阴历），梁启超在汤觉顿的陪同下，带着女儿梁令娴，乘日本轮船“笠户丸”号离开横滨，驶往台湾。“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sup>3</sup>轮

<sup>1</sup> 甘得中：《献堂先生与同化会》，见《林献堂先生追思录》，第 29 页，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 1960 年版。

<sup>2</sup> 甘得中：《献堂先生与同化会》，见《林献堂先生追思录》，第 28—29 页，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 1960 年版。

<sup>3</sup> 丁文江、赵丰年：《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54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

船经马关向基隆航行。这条路线，就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台湾的路线。梁启超回想起当初“公车上书”，爱国救亡，台湾举人含泪请命，反对割让台湾，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屈服于侵略者，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同胞不得不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想到此，不禁悲从心起，感慨万分。

在谈到赴台的原因时，梁启超说：“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咸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呼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已也。”<sup>4</sup>可见，梁启超赴台湾考察，是想了解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真实情况，以备他日后回国施政之用。同时，正如早先林献堂力邀梁启超访台一样，台湾遗老对当年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的梁启超，也怀有深厚的情谊，梁启超也想在台湾遗老中间募集资金，作为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办报的经费。

25日，“笠户丸”停泊于马关。这里正是当年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所在，梁启超触景生情，留下了一首悲伤至极的诗句：“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惟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sup>5</sup>以此表达台湾被割占的悲愤之情。

28日，轮船逐渐向基隆港靠拢，梁启超眼见祖国的宝岛台湾就要到了，非常兴奋，在船中成诗十余首。但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实行高压统治，不准许中国大陆人士登陆台湾。当梁启超一行抵达基隆时，日本警察阻止其上岸。梁启超在回忆这一经历时写道：“舟入鸡笼（指基隆），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去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日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者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惟有增恚。”<sup>6</sup>经过一番周折，梁启超终于登岸，在众多怀有“故国之思”的士绅、文人的迎接下，下榻于日之丸旅馆。梁启超一到台湾，就领教了殖民者对中国人的敌视，感受到了同胞之间的骨肉深情。在台北，梁启超首次目睹了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苛政下的非人生活，亲眼看见一些古建筑被日本人毁坏，遂作诗《台北故城毁矣留其四门》一首：“清角吹寒日又昏，井干烽榭也无痕。客心冷似秦时月，遥夜还临丽正门。”<sup>7</sup>以此表达悲伤的心情。

3月3日，台湾同胞出于对祖国亲人的热爱和对梁启超的敬重，特意在台北荟芳楼举行接风宴会，热烈欢迎这位“变法维新”的著名人物。参加者多达百余人。日本殖民当局如临大敌，派了不少侦探特务进行监视。但台胞全然不顾，欢迎会按时举行。先由林献堂代表全台同胞致欢迎词，接着，梁启超致谢词，他的讲演言词委婉，但内容深刻，气氛热烈，在场台胞深受感动。台湾虽然割地于日本，但人们的中国心、同胞情是永远割不断的。梁启超对台湾同胞热情友好的招待很是感动，加之亲眼看到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特务监视，不由伤感。由于不能直抒胸臆，梁启超只得在宴会之后赋诗表意。其中有一首诗曰：“劫灰经眼尘尘改，华发侵颠日日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纪残春。”<sup>8</sup>梁启超在诗中所表达的悲怆之情，让听者莫不动容。

<sup>4</sup> 《游台湾书牍》第1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5</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0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6</sup> 《游台湾书牍》第2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9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7</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0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8</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永久霸占台湾，消除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观念，强制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例如，改建台北市，将台北市按照日本人的理念进行改造，实行野蛮的文化侵略等。梁启超到台湾时，已经有一大批台湾同胞的房屋被拆，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梁启超在《拆屋行》这首诗里，记叙了一位新寡的病妇，携带8个孩子，“身无完裙居无屋”，“悬丝十命但恃粥”，“出门十步九回首，月黑风凄何处路？只愁又作流民者，明朝捉收官里去。”“游人争说市政好，不见街头屋主人。”<sup>9</sup>梁启超描述了台湾同胞的痛苦，又以讽刺的手法，严厉控诉了日本殖民当局的罪恶行径。

梁启超在林献堂、林幼春、甘得中、汤觉顿等人陪同下，先后考察了台中、台南等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在日本殖民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老百姓过着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例如，当时的日本资本家正在各地兴建新式糖厂，总督府往往动用警察力量强迫征购农民的土地种植甘蔗，而收购农民土地价格远低于市价，致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而无以生计。台湾的现状完全不是日本人所“美化”宣传的那样。梁启超亲眼看见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斑斑劣迹，进一步认清了日本政府虚假宣传的实质。梁启超深深哀叹，“吾兹行乃大失望”，“吾旬日来别心怵目，无泪可挥”。虽然台湾同胞“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却“入冬北风起，饿殍阬路歧”，“旧田已卖空，新田取难袭”。苦难的台湾同胞为了谋生，不得不“鬻身与官家，救死倘犹及，悠悠彼何人，哀哀此束湿”。台湾同胞的悲惨遭遇，使梁启超“重伤累感，岂笔札所能传者”，深表同情；同时，他又鼓励台湾同胞，振奋精神，“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为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饮”，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改善生存环境，改善生活条件。<sup>10</sup>

在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下，台湾人民几乎没有言论自由。为开启民智，不忘国耻，台湾进步的知识分子“相率以诗自诲”，成立了许多诗社之类的民间组织。当时著名的诗社有竹社、南社、瀛社等，大家相互联络，交流政治观点，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林献堂也组织了菜园诗社。林献堂的侄儿林幼春，自幼就十分崇拜梁启超，说“我生识字即识公”，他领导的“栎社”就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可见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之深。

梁启超游台期间，受到了各地诗社成员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聚会、咏诗。梁启超更是百感交集，以诗寄情、以诗言志，留下了诗89首，词12首。由于日本特务的暗中监视，大家不能直抒胸臆，只有在诗词中隐晦地表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极度不满，体现台湾同胞的哀怨之情，也表达了台湾同胞渴望解放，思念祖国的心情。梁启超在他的诗词中写道：“绵绵列岫烟如织，暖暖平畴翠欲流。好是扶筇千步蹬，依稀风景似扬州。”“不知消瘦姮娥影，入夜还能似旧时？”“且莫秋风怨迟暮，夕阳正在海西头。”“最是夕阳无限好，残红苍翠接中原。”<sup>11</sup>梁启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宝岛大好河山，表达了台湾与大陆本为一体、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热切期盼台湾回归祖国，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共同奋斗。

游台期间，梁启超深刻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深深眷恋之情。于是，他改编了一组台湾民歌，形成了十首《台湾竹枝词》，借一对恩爱夫妻难舍难分的情景以及女子与郎君的分离后相思的苦痛，表达了台湾人民盼望与祖国大陆团圆的真挚感情。其中有这样几句：“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离树何时还？”“今生

<sup>9</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0</sup> 《游台湾书牍》第4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201—202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1</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2—6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够受相思苦，乞取他生无折磨。”<sup>12</sup>这样真挚的情感，强烈地撞击着台湾同胞的心灵。在另一首诗《相思树》中，梁启超以台湾的山水和江南的草木连成一片，同根同源来隐寓两岸同胞密不可分的亲情：“终日思君君不知，长门买赋更无期。山山绿遍相思树，正是江南草长时。”<sup>13</sup>

由于日本殖民当局拒绝中国大陆货物进入台湾，台湾所有的日用商品差不多都来自日本，且商品价格远高于日本本土，台湾同胞饱受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经济侵略，生活悲惨凄苦，这引起了梁启超的深深忧虑。梁启超游台一月，帐触很多，耳所闻目所见，莫不失望，以致“无限懊恼，无限愤抑”。<sup>14</sup>

3月29日，梁启超满腹惆怅地离开了台湾。在海轮上，他给《国风报》编辑写了一封信，谈及游台观感，“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sup>15</sup>航行途中，梁启超又写了20多首诗，记叙了自己伤感、哀愁的心绪。其中一首写到：“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愁。入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无家更安往，随意弄扁舟。”<sup>16</sup>在《浣溪沙·台湾归舟晚望》中，梁启超概述了此次游台的经历及失望、悲愤、哀愁的低落情绪，同时，他对台湾和大陆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老地荒天闕古哀，海门落日浪崔嵬。”“凭舷切莫首重回，费泪山河和梦还。凋年风雨挟愁来，不成抛却又徘徊。”<sup>17</sup>随后，梁启超就考察所得，整理出了50万字左右的《台湾游记》，并与商务印书馆商议出版，以醒国民。但因游记记叙了台湾的真实状况和梁启超的真情实感，对日本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不利，被日本政府扣押了。后来该游记也未公开发表，原稿也不知去向了。

梁启超出访台湾，不但亲眼目睹了日本统治台湾的真相，加深了对日本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而且以诗歌、座谈、讲话等形式宣传了爱国思想，增强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民主意识。梁启超在台期间，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诗人、遗老的影响，则极为广泛而深刻。日本殖民者17年来的残酷统治，使台湾同胞受尽了欺凌和压迫，台湾同胞集结在胸中的一股悲愤之气也因梁启超的温存与慰抚，暂时得到了宣泄。同时，台湾同胞眷怀祖国、热爱民族的丹心，也总算找到了倾诉的对象。梁启超不但被视为祖国的象征，中国文化的代表者，更是有如可以一诉衷曲的亲人。所以，梁启超出访台湾，极大地增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思慕和热爱！<sup>18</sup>

### （三）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对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

作为近代中国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台湾爱国士绅及知识分子，特别是他帮助确定的爱尔兰人之斗争策略，即温和主义的反日斗争策略。在日本殖民统治已经巩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已被镇压的情况下，<sup>19</sup>通过开展社会运动，在体制内争取台湾人的政治权利，以减轻台湾人民的痛苦。这一方式，不仅具有必然性，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可能。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新形势下，林献堂、林幼春等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相继发起了“六三法”撤废运动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sup>12</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5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3</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4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4</sup> 《游台湾书牍》第5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202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5</sup> 《游台湾书牍》第6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203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6</sup> 《游台湾书牍》第6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203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7</sup>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97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sup>18</sup> 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第224—225页，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5月5日版。

<sup>19</sup> 1915年8月余清芳等领导的西来庵起义被血腥镇压后，大规模的武力反抗斗争已基本停止。

所谓“六三法”，就是日本政府为在台湾建立专制独裁的总督统治而于 1896 年 4 月发布的《第六十三号法律》（简称“六三法”），作为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人民的“法律依据”。该法律规定，台湾总督对其管辖区域内所颁布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加之先前颁布的《台湾总督府条例》，这就使台湾总督集行政、立法及军事大权于一身，对台湾人民实行高压、专制的殖民统治。据此，台湾总督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的律令，包括《匪徒刑罚令》、《法院条例改正令》等，残酷地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世界民族自决浪潮的冲击下，在内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影响下，林献堂、蔡惠如、蔡培火、林呈禄等人认为时机成熟，主张以废除“六三法”的方法，削弱台湾总督的权力，赢得一些自由和民主，提高台湾人民的政治地位。

1918 年 8 月，林献堂到日本，与在东京的台籍留学生频繁接触，并且在东京神保町中华第一楼宴请 20 多名台湾留学生，讨论“对台湾当如何努力”的问题。在此期间，大家通过了施家本提出的“撤废六三法”议案，成立了“启发会”，并在“启发会”中设立“‘六三法’撤废期成同盟会”，由林献堂出任会长。林献堂牢记梁启超“切务轻举妄动，而供无谓之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本国之手段，广结日本中央政界之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过分压迫台人”的指示，大量结识日本政界要人。10 月，林献堂又在日本会晤了新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向其陈述自己对台湾政治改革的看法。但田健治郎认为：“台湾实际情况还没有达到撤废‘六三法’的地步。”<sup>20</sup>“六三法”撤废运动前途渺茫。

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唤起民意，1920 年 1 月 11 日，蔡惠如在东京以启发会为基础，组织台湾留学生，又发起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成立的目的是要领导台湾的民族运动。7 月 16 日“新民会”出版了台湾近代民族运动的启蒙刊物《台湾青年》。虽然林呈禄对“新民会”命名解释为“取大学篇中‘作新民’之义”，但从名称上来看，“新民会”不能不说是受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陈独秀《新青年》的“启发”。台湾同胞的思想启蒙运动深受祖国革命形势的影响。

《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向来，这些旅居日京的台湾留学生都努力要跟内地的风俗习惯同化。对社会问题、政治运动等事没有什么深刻的关心。因此，时常被中国留学生，以及朝鲜留学生等嘲笑，说他们都是‘唯唯是诺，屈从于日本统治之下愚’，也不敢起而抗辩，可是智能的开发，必然要引起对事物的批判，恰好民族自决主义的浪潮影响到他们来，或是受了中国革命新展开的刺激，学生的思想倾向竟然一变，主张：‘台湾非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不可’，唤醒了民族意识，时常聚集，酿成了朝向图谋提高台湾人的地位，企图自由解放的运动的空气。”<sup>21</sup>

“新民会”的成立和《台湾青年》的出版，推动了台湾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0 年秋，林献堂又赴日本，向日本政界要人呼吁撤废“六三法案”。由于得不到支持，11 月 28 日，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共两百多人，在东京集会，讨论“六三法案”撤废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辩论。反对撤废“六三法案”的人认为，即使废除了“六三法案”，台湾人民依然跳不出日本国法律的限制；保留“六三法案”，可以表示台湾为日本殖民地的特性，正好抵制日本对台湾的同化，保持台湾的民族性。这种观点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最后，由林献堂裁决，决定不再进行“六三法”撤废运动，为了不刺激日本统治者，也不公开宣布台湾“自治”，而采取请愿的方式要求设置台湾议会，实现台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随后，林献堂出任新民会会长。新民会借助林献堂的声望不断壮大。在林献

<sup>20</sup> 包恒新：《台湾知识词典》，第 109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sup>21</sup> 转引自王晓波：《台湾史论集》，第 183 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 6 月版。

堂的带领下，“新民会”确定了三个行动目标：一、为增进台湾同胞之幸福，开始政治改革运动；二、扩大宣传主张，联络台湾同胞之声气，发行机关杂志；三、图谋与中国同志多多接触之途径。其中，第一个目标即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第二个目标则表现为《台湾青年》的创刊。<sup>22</sup>自此，台湾的民族运动由“六三法”撤废发展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台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921年1月30日，由林献堂领衔，178人共同签名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正式提交给日本帝国议会。请愿书称：“帝国议会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以法律第六十三号付与台湾总督以发布命令代替法律之特权，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之统治机关，……民众所受之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sup>23</sup>他们要求日本人承认台湾的特殊性，给台湾人参政权，由台湾人自己组成的台湾议会，决定台湾的地方事务，对台湾的法规及预算具有决定权；运动的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获得一定限度的内政自治权，争取以合法斗争方式获取政治权利。

但是，日本议会根据台湾总督府提出的意见，“断不允许设立类似帝国议会之台湾议会”，决定“不采择”该请愿书。<sup>24</sup>随后，日本政府又以敕令第241号公布了所谓“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自任会长，总务长官任副会长，另由总督任命在台官吏7人、日本人9人、台湾人9人为评议员，在总督监督下，就总督的咨询，提出施政意见。日本殖民者想用“台湾总督府评议会”之类有名无实的机构搪塞了事。

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联名上书，又遭到了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否决。同年5月，林献堂回到台湾，当众披露了第二次请愿的结果。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台湾总督府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社论和文章，指责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求独立”，是一种“叛逆”行为。日本人还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林献堂施加压力，企图使林献堂屈服，放弃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1923年1月，运动的另外一些积极分子蒋渭水、石焕长等发起组织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准备开展第三次请愿运动，被台湾总督府根据“治安警察法”第一条勒令禁止。蒋渭水亲往东京，会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重新建立了“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书。同年12月，蒋渭水等回到台湾，继续开展活动。然而，日本殖民当局为阻止运动，阴谋制造了所谓“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在全岛进行大搜捕，将蒋渭水、蔡惠如、陈逢源、赖和等29人逮捕入狱。另外，殖民统治当局对其他参加请愿的人员进行打击，“服务官方机构者，立即被解职，服务于银行公司者，透过该银行公司，各予以免职，有关公卖事业者则剥夺其特权，与银行有借贷关系者，拒绝其资金之融通，且严禁有关政治之演讲。”<sup>25</sup>这表明，想走台湾议会的路子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从1924年1月30日至1934年2月26日，林献堂等还12次上书请愿，要求设置台湾议会，但每次都遭到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的拒绝。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sup>22</sup> 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第76—77页，自立晚报社1971年版。

<sup>23</sup> 王芸生：《台湾史话》，第8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sup>24</sup>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增订本），第2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2版。

<sup>25</sup> 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第130页，（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版。

最后归于失败。

“六三法”撤废运动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就运动的性质而言，是台湾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就运动的方式而言，是一种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就运动的渊源而论，则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温和主义斗争路线在台湾的实践。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不可能达到，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愿望和要求，促进了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具有进步意义。正如台湾学者王晓波先生所说：“在殖民地体制下，台湾议会的不能成功，只能‘缺憾还诸天地’，但从民族运动的观点视之，却是一项成功的策略。”<sup>26</sup>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方面，改良主义的余波继续以其他内容而表现；另一方面，由于激进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一批台湾青年开始投身于以推翻殖民统治为目标的民族革命活动。直至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台湾同胞把台湾的解放寄望于全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他们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也就没有台湾同胞的解放。一批批爱国青年奔赴祖国大陆，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为台湾也为全中国的解放而斗争。经过8年的艰苦奋战，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也从日本殖民主义的铁蹄下彻底解放出来。

由此看来，在梁启超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下的台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它上接台湾同胞的武装起义斗争，下连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斗争方式看，它是大规模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所采取的和平抗争方式。这一斗争阶段和这一斗争方式，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上不可缺或的一页。梁启超与台湾的情缘，也应载入中国近代历史的史册，更应载入台湾地方历史的史册。

张春英：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邮编：430060；电话：027/87343060  
E-mail: zhangcy125@sina.com (2004.6.24.发厦门会议)

(会议论文，原文印发，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

<sup>26</sup> 王晓波：《台湾史论集》，第43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6月版。